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论十大关系》^{*}

孙 亮

【摘要】《论十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论十大关系》不仅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表作,而且还是“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开端。《论十大关系》彰显了中共社会主义探索的政治、思想和经济三重目标,引领了建国后的实践探索高峰。《论十大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延伸的理论成果,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之延伸、内容之延伸等内容。同时它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科学方法论、方针政策等方面的准备。

【关键词】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8)05-0004-07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来看,《论十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开端,也是唯一一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被提到的毛泽东论著。邓小平认为:“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②梳理相关文献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以后,学界对《论十大关系》的论述颇多,相关研究较为深入。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论十大关系》的生成背景、形成和发表、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历史地位,以及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论十大关系》相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总体而言,已有研究成果侧重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研究《论十大关系》,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研究《论十大关系》的相关论述则较少,研究尚待加强。下面将以此为题作进一步探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期的研究,近年颇受学界重视。但由于标准不一,范式迥异,至今仍无定论。相比较而言,“三阶段说”业已成为学界所接受的主流观点。“三阶段说”以党史分期为基础,以理论飞跃为依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为3个阶段。第二个阶段(1949~1978)处在两个历史性飞跃的中间,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如何理解1956年前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一般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下限有一个时间差。”^③从理论飞跃和实践革命的“时间差”上来解读1956年前后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解释“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的完整涵

* 本文为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研究”(16CDJ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页。

③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义。以《论十大关系》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它作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的理论成果”,其原因至少还应包括时代主题转化和以苏为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之延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之延伸等3个方面的内容。

(一) 时代主题转换和以苏为鉴。时代主题的转换是《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时空背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提出之初的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时代主题并没有被突出加以强调,主要是因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而言,依然处于资本帝国主义时期,战争和革命是那个时代的底色和主旋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建立,时代主题已悄然由战争和革命转换到追求和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对此时代巨变,毛泽东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预判到时代主题的转换“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①

(二) 以苏为鉴自始至终贯穿于《论十大关系》全文之中。毛泽东听取国务院各部委的专题汇报开始于1956年2月14日,这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恰逢同一天,但两者的推进走向却截然相反。毛泽东听取专题汇报有序推进,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抛出了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就使毛泽东开始系统反思苏联模式,开始把我国建设实际与苏联教训结合起来进行思考。这最终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②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强调要以苏为鉴,不能仅仅局限在反思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斯大林个人的错误上,同时还应包括要汲取中共在革命过程中盲目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训。因此,从中共的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以苏为鉴、汲取教训才是完整理解毛泽东这段话的合理路径。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之延伸。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学界有多种观点。有学者持“两主体说”,即从事相关理论研究的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③。有学者持“三主体说”,即领袖群体、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④。也有学者持“五主体说”,即包括党的领袖、思想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⑤。上述观点从不同的层次、角度和时间节点上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各有可取之处。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会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推进而相应调整,或缩减,或延伸,不是定于一尊,僵化不变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⑥这就阐明了其基本方针,而且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延伸的主要原因。这里“一切积极因素”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因为两者在目标、功能、作用的取向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不仅包括已转型成为执政党的中共和它的领袖群体,还应包括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综合可知,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相比较于之前,其范围得以显著扩大延伸。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之延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与中共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紧密相连,并环环相扣,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也应随之延伸。建国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之延伸,主要体现在党从集中探索民主革命胜利之路延伸到集中探索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③ 俞吾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期。

④ 陈金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

⑤ 徐松林《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求实》2006年第8期。

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页。

会经济建设之路上来。《论十大关系》反映了毛泽东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努力尝试走出一条既区别于苏联教条化的道路,也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其实质是找到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后来也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而言,“照抄外国经验”主要是指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复制与应用,这还谈不上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实质上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的拓展及延伸。

二

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完全不同的内容^②。《论十大关系》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理论品质和思维特征,具体来说,《论十大关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开端,彰显了三重目标,引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实践探索高峰。

(一)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开端。最早提出“第二次结合”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1956年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③从时间上来看,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恰逢毛泽东大规模听取国务院各部门汇报以及苏共二十大之后。而从性质上来讲,“第二次结合”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十大关系》作为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开端,是与1956年前后所形成的新一轮党的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的。周扬曾提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历过3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④。笔者认为除上述3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外还有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那就是1956年前后,以苏为鉴,破除迷信与个人崇拜,围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苏共二十大及其秘密报告,毛泽东就说过“它打破了神话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⑤周恩来对此也认为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⑥。这次思想解放最终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一系列成果。因此,从时间逻辑上看,《论十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开端。

(二)第二次结合的目标。目标是主体在一段时期内一定的环境下发挥能动性所期望达到的结果,具有方向性、社会性、实践性等多重特征。根据现有文献,笔者认为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第二次结合”主要基于实现三重目标:第一,就是要顶住国内国际压力,排除多重困难。当时的压力主要来自苏共二十大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一股强大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思想偏差和行动混乱。这就要求中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走样。这是第二次结合的政治目标。第二,之所以叫做“第二次结合”,毛泽东是要把它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相区别。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沉醉于第一次结合的成果中,不能满足于第一次结合的成功实践中,要深刻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适应新形势,迎接新任务,从而实现新的结合。这是第二次结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3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④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第2版。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7页。

⑥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21页。

合的思想目标。第三,就是要独立探索出一条区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严格按照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办事,找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第二次结合的经济目标。总体而言,在第二次结合的政治目标、思想目标、经济目标等三重目标之中,经济目标是首要目标,这是由我国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所决定的。同时,三重目标又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同向而行,相互影响。

(三)第二次结合的实践探索高峰。之所以说《论十大关系》是第二次结合的实践探索高峰,是因为在内容上其侧重于建设实践,在目标上其定位于探索,在思想上其达到了高峰。

第一,从内容上讲,《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的是经济建设实践问题。这一点可以从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印证。“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①这实际上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共已经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解决经济建设领域的矛盾上。

关于调整重、轻、农3个产业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涉及到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问题。毛泽东深刻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衡、农民利益受损的教训,开创性地提出在保持重工业投资生产的基础上,要适时适当提高轻工业,尤其是农业的投资与发展,以此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消费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主要涉及到区域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问题。毛泽东客观指出了近代以来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的不合理现状,批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相关部委对沿海工业建设持有的消极态度和实行的不当政策,“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毛泽东强调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与此同时,内地工业也必须大力发展,以此可以有效平衡工业发展的区域布局。鉴于沿海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业优势,毛泽东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利用沿海工业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的思想。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涉及到对国家安全整体判断,以及如何处理好在国家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协调好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两者的关系。他认为在现阶段保持一定的国防力量和军费建设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减少经济建设费用。相反,需要增加经济建设费用,扩大经济生产资金投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国防建设,提高国家安全水平。

关于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关系,这实质上已涉及到国家经济体制问题。毛泽东指出要深刻汲取苏联教训,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毛泽东认为在经济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不能只顾一头,片面强调国家利益,过分注重整体利益,而忽视或忽略单位、个人利益。这种体制如长期实施必然会损害民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其侧重点则是相关收入、利益向“民”倾斜,为“私”提高。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涉及到国家管理体制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央、地方两者之间正常的关系,中央主导一切,地方严重依赖中央,地方因此失去了自主性和机动权。因此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改变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其核心要义就是在维护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权力下放”。其理论依据则是以权力的重新分配来规范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边界,借此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总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对上述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既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和苏联模式的反思,也是对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的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实践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

第二,从目标上而言,《论十大关系》初步探索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及制度。首先,初步确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及制度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对于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来的中共而言,如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都是亟需从理论和实践中加以解决的。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国民经济在中共的领导下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三大改造”也已基本完成。到了1956年,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指导思想。《论十大关系》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初步确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即借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从“走俄国人的路”转变到“走自己的路”。

其次,初步探索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把我国由传统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制造的工业国,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奋斗目标,但是囿于当时形势,尚未具体实施。立足当时回溯世界各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一般有两条工业化道路可供借鉴选择。一条是立足资本主义制度,遵循市场经济,呈渐进发展的欧美式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另一条与此相反,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遵循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客观来讲,两条工业化道路在性质、模式、路径、速度上特征迥异,实施效果上也是互有利弊。基于多方面原因,中共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但鉴于苏联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在国家以重工业作为投资重点的前提下,要适当增加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还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一条以农业、轻工业为基础,以重工业为重点,三者同时并举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图景。这是一条既区别于欧美、又区别于苏联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

最后,初步探索了对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改革。一般而言,革命年代军事上的高度中央集权有利于令行禁止,以获得战争的胜利。而在和平时期过分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机制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①。毛泽东认为要在维护统一、适当集中的前提下,应保持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地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对独立性和政策灵活性。“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②毛泽东的这些观点虽然没有展开深入论述,但是这已经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即将确立之时,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以及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限、集体与个人的利益调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融合等所做的初步探索与思考。

第三,从思想上而论,《论十大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代表作,引领了此轮思想解放的前进步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集中体现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的几篇重要论著中。显而易见,《论十大关系》同其它论著相比其形成时间相对较早。其次,《论十大关系》形成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性。《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大规模调查基础之上的。整个调查前后43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集中听取了多达43个部门的汇报,中间还穿插着多次会议讨论,以至于毛泽东说这段时间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继1955年农业合作化问题调查后所做的又一次大规模调查。因此可知,《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和实际运用。最后,《论十大关系》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两类”矛盾、“双百”方针等诸多思想的合理内核,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大奠定了基本方针。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页。

设中“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①并且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②《论十大关系》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及其解决方法的思想,即对于敌我矛盾,关键要“分清敌我”,施以专政改造。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关键要“分清是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论十大关系》为最终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众所周知,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展开论述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一文中。而在这之前的1956年4月28日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首次明确提出“双百”方针。关于《论十大关系》与中共八大的关系,刘少奇就认为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论十大关系》而提出的^③。因此有学者就认为中共八大所确立的指导思想直接来源就是《论十大关系》^④。基于此,可以推论《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能够与八大相得益彰、相提并论。

三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第二次结合的时间相对短暂,但依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既包括理论思想,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历史进程如果以此接续推进,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就应该定位于此。但历史不能假设,历史进程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到了195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第二次结合嬗变为理论与实际的背离。随着反右派斗争等政治运动的开展,毛泽东逐渐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形成了错误的认识并付诸行动,以致最终酿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时期、全局性的灾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严重迷误和沉痛挫折之中。

目前学界主要是从整体上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30年(1949~1978),认为这个阶段从正反两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政治保障、经济基石、思想准备、历史参照以及干部资源等5个方面的准备^⑤。这种观点辩证而全面地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30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已为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所证明。从整体上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30年,具有宏大叙事的典型特征,即整体性、目的性、统一性等多维特征。我们认为以《论十大关系》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的作用,或许能从另外一个层面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细微而独到之处。具体而言,《论十大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如下4个方面的准备。

第一,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论十大关系》之所以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科学的内容,而且在于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作用。纵观全文,对立统一规律贯穿始终。毛泽东在论述十大矛盾关系的过程中,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把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次要矛盾的解决促进主要矛盾的推进,这是方法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与发展。同时,毛泽东坚持“两点论”,反对绝对化,“一万年都有两点”,“说只有一点,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⑥从而旗帜鲜明地“把‘两分法’作为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④ 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⑤ 龚育之、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3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

分析一切问题的出发点”^①。

第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换与时代主题的转换紧密相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改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换。之所以说《论十大关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换,是因为以《论十大关系》作为分水岭,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是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之后主题转换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路径。简而言之,即从革命斗争的主题转换到建设发展的主题。虽然这种主题转换随后因为多种原因曲折甚至反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因此而延迟。但这不能成为抹煞《论十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起的标志作用的理由。

第三,勾勒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框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主义“一化三改”的初步完成,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即将确立,社会主义建设也即将全面展开。鉴于此,在汲取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初步积累的建设经验,以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作为切入点,毛泽东从十种关系中勾勒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在其中初现雏形,社会主义大厦整体框架已隐约可见。

第四,激发了探索改革的精神。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十大关系的探索和思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之后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薄一波就认为1956年前后中共内部兴起的调查和探索的新风同毛泽东对十大关系进行的探索是分不开的^②。总之,《论十大关系》中所蕴含的探索改革精神,以及由此而迸发的改革热情,不仅在当时得以彰显,更是在1978年之后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四

在高度肯定了《论十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后,还需要冷静指出其历史局限性:虽已意识到以苏为鉴的必要性,但没有透彻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在实践中也没有彻底摆脱其影响;虽已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换,但这种主题转换多有波折乃至反复,缺少稳定性及可持续性;虽已提出对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但这种设想依然局限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虽已涉及到对外开放,向外学习,但没有给出具体路径和实施方案。上述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受到历史发展阶段和人的认识规律的影响。总而言之,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尚未完全展开、各种矛盾的本质尚未完全表现、国内外环境又异常复杂的境况下,《论十大关系》体现了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已经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水平。

(本文作者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湖北 430072)

[责任编辑:江俊伟]

^① 参见李力安《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纪念〈论十大关系〉发表40周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347页。